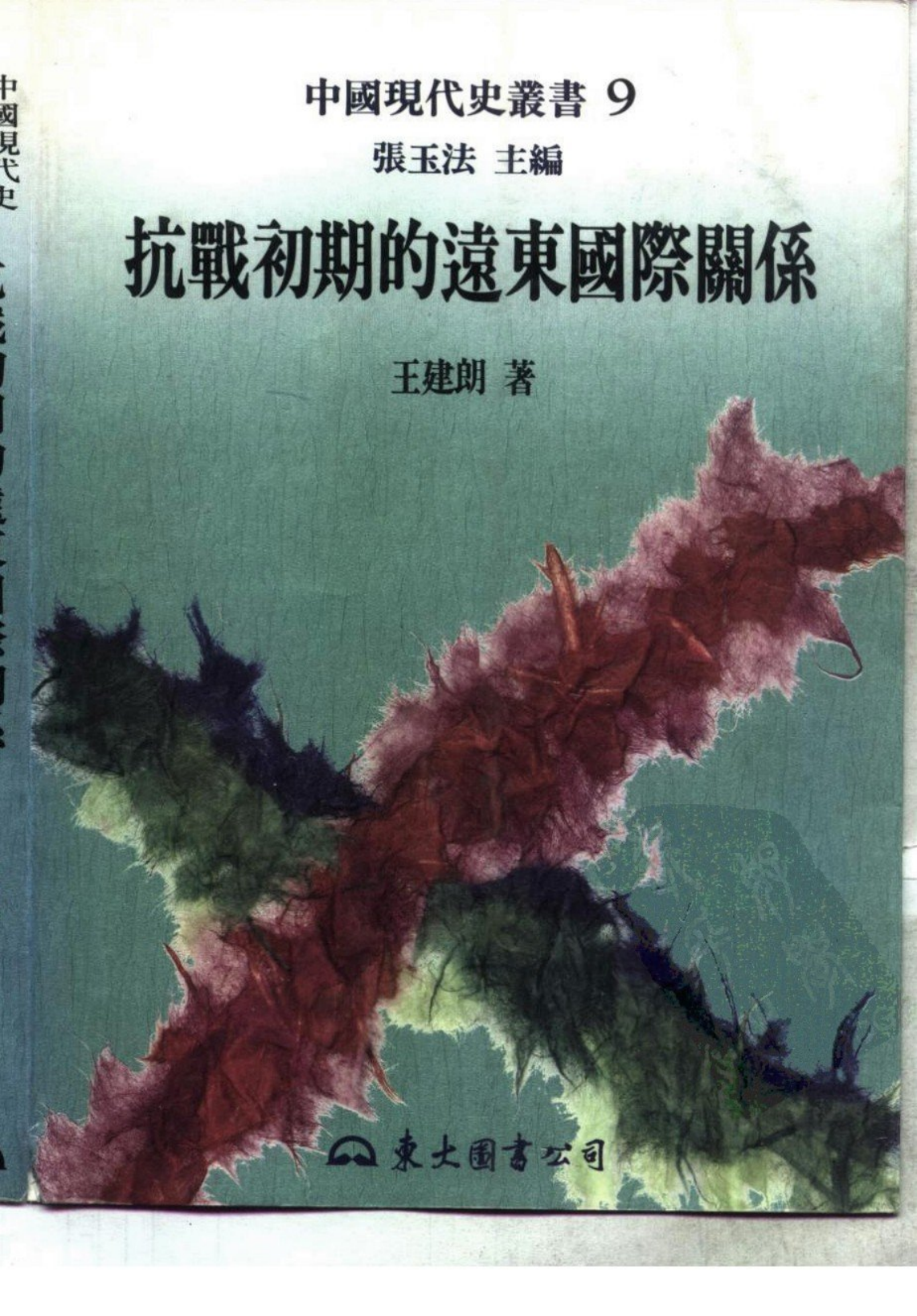


中國現代史叢書 9

張玉法 主編

抗戰初期的遠東國際關係

王建朗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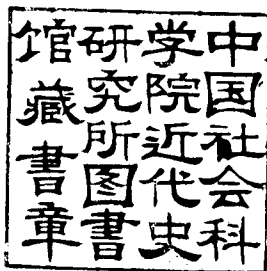
 東大圖書公司

中國現代史叢書 9

張玉法 主編

抗戰初期的遠東國際關係

王建朗 著



 東亞圖書公司

Wt 504/01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抗戰初期的遠東國際關係／王建朗著．

-- 初版．-- 臺北市：東大發行：三
民總經銷，民85

面；公分．--(中國現代史叢書)
參考書目：面
含索引

ISBN 957-19-1951-9 (精裝)

ISBN 957-19-1932-2 (平裝)

1. 中國-外交關係-民國26--34年 (1937-1945)

624.4

85001597

◎ 抗戰初期的遠東國際關係

著作人 王建朗

發行人 劉仲文

著作財
產權人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

發行所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

郵撥／〇一〇七一七五—〇號

印刷所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銷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門市部

復北店／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

重南店／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

初版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三月

編號 E 62042

基本定價 陸元肆角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一九七號



ISBN 957-19-1932-2 (平裝)

主編者序

二十世紀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變遷迅速的世紀。在二十世紀將要結束以前，回頭看看二十世紀初年的中國；或從二十世紀初年的中國，看看二十世紀將要結束的中國；不僅歷史學家會不斷檢討這一段的歷史總成績，走過這個時代的人或走不過這個時代的人，無論自己流過多少汗、多少淚、多少血，受過多少飢寒、多少苦難、多少折磨，還是犧牲過什麼、享受過什麼、獲得過什麼，站在二十世紀的盡頭，不能不對這一個世紀作些回顧、作些省思，然後勇敢地走向或走入二十一世紀。這是東大圖書公司出版「中國現代史叢書」，為讀者提供歷史資訊的最大旨趣。

二十一世紀是否為中國人的世紀？有人很關心，有人不關心。但在地球村逐漸形成的今日，不管是冷漠還是熱心，不管是不自願還是自願，都得住在這個村，並為這個村的一員。就中國現代史的研究而論，不僅臺海兩岸的歷史學者，多投入研究，或表示關懷，歐美及日本等地的歷史學者，不少亦研究中國現代史。這便是史學界的地球村。

中國現代史的起點，臺海兩岸的學者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說來，臺灣地區的學者，主張始於辛亥革命時期；大陸地區的學者，早年主張始於五四運動時期，近年又主張始於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外國學者的看法，不出上述兩種。嚴格說來，臺海兩岸學者對現代史分期的看法，都受到政治的影響。許多學者以鴉片戰爭作為近代史的開端，也是受政治的影響；因為鴉片戰爭被視為反帝反封建起始

2 抗戰初期的遠東國際關係

的年代。

爲了擺脫政治的糾葛，可以從世界史的觀點來考慮中國歷史分期問題。梁啟超將中國歷史分爲中國之中國、亞洲之中國、世界之中國三個時期，如果將中國人在中國境內活動的歷史劃爲上古史，將中國人向亞洲其他地區擴張的歷史劃爲中古史，將中西接觸以後，中國納入世界體系劃爲近代史，則中國近代史應該始於明末清初。明末清初的中國，不僅與歐洲、美洲進行海上貿易，而且歐洲帝國主義的勢力已經進入中國，譬如葡萄牙佔有澳門（1557）、荷蘭（1624）和西班牙（1626）佔有臺灣，俄國進入中國黑龍江流域（1644）。在葡人佔有澳門以後的二、三百年，中西之間有商業、文化、宗教交流，到1830年代以後，因通商、傳教所引起的糾紛日多，由於中國國勢不振，利權、領土不斷喪失，成爲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對象，到1897-1898年的瓜分之禍達於頂點。1899年英、美發佈「中國門戶開放政策」以後，中國免於被殖民瓜分的局勢始獲穩定。我們可以將1557-1899年的歷史定爲近代史的範圍。1901年，中國在義和團的激情反帝國主義以後，開始進行教育、經濟、政治改革，革命運動亦大獲進展，將歷史帶入現代時期。

中國上古史爲中國歷史文化的創建期，中古史爲中國歷史文化的擴張期，近代史爲中國歷史文化的收縮期，現代史爲中國歷史文化的更新重建期。本叢書所謂中國現代史，即始於1900年，涵蓋整個二十世紀，如果中國更新重建的大方向不變，亦可能涵蓋二十一世紀及其以後。儘管由於政治的糾葛，「中國」一詞在近數十年的臺灣及海外各地已經變成模糊的概念，出現了歷史中國、文化中國、大陸中國、海洋中國等名詞，但中國畢竟是現在世界上歷史悠久、土地廣大、人口衆多的國家，不能因爲它時常出現外力入侵、內部分裂，而忽視它的

歷史存在。而且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中國躍為世界五強之一，它在世界上的地位愈來愈重要。因此，檢討二十世紀的中國史，在世界史中也饒富意義。

現代史上的中國雖然災難重重，但亦有機會撥雲見日，這是中外史家對研究中國現代史有興趣的原因之一。但不可否認的，由於臺海兩岸長期缺乏學術自由，而臺海兩岸及世界各國有關學者，由於掌握材料的性質和多寡不同，許多現代史的著作，流於各說各話，這是學術上不易克服的困難，有些困難則是學術界的不幸。本叢書希望包羅一些不同國度、不同地區、不同觀點的學術著作，透過互相欣賞、批評，以達到學術交流的效果。收入本叢書的專著，儘管有不同的理論架構或觀點，但必須是實證的、避免主觀褒貶的。

傳統中國史學，有些持道德主義，主觀的褒貶性很強；近代中國史學，有些受作者個人信仰或好惡的影響，流於宣傳或謾罵；凡此都妨害歷史求知的客觀性。本叢書在選取稿件時，當在這方面多作考量。

承東大圖書公司大力支持，使本叢書得以順利出版，非常感謝。收入本叢書之九的《抗戰初期的遠東國際關係》係由王建朗先生的博士論文改寫而成。王建朗，江蘇泰縣人，一九五六年生。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一九八六年獲復旦大學研究生院歷史學碩士，一九九一年獲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歷史學博士，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自一九八五年起先後在《復旦大學學報》、《抗日戰爭研究》、《近代史研究》及《歷史研究》等刊物上發表有關中外關係史和抗戰軍事史論文多篇，合著有《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外關係》，合譯有《毀滅的種子》和《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等。抗戰初期的遠東國際關係，圍繞中日戰爭運轉，頭緒紛繁。作者爬梳史料，綱舉目張，理出了清晰的輪廓。德國在最初半年不僅保持中立，且繼續向

4 抗戰初期的遠東國際關係

中國提供軍事物資；陶德曼調停失敗後，德國立場始發生逆轉。蘇聯爲了增強遠東方面的防日力量，曾向中國提供大量援助，但援助多基於利己的考量，且有一定的限度。作爲遠東華盛頓體系主要構造者的英、美、法等國，情況不一，一般而論，最初大都對日本有所妥協，隨著對日本的侵略意圖和對中國抗戰的戰略意義逐步有所認識，他們開始由中立轉向援華制日。中國政府展開靈活主動的外交活動，積極爭取國際社會支持，力圖最大限度的爭取友邦、孤立敵國，從而獲得來自不同陣營且利害關係各異的有關大國的支持。日本外交則一錯再錯，逐步走上四面楚歌的道路。全書結構謹嚴，引證充足，敘事詳實，可讀性高。特向讀者推薦。

張玉法

1996年1月12日於中央研究院

自序

在傳統的抗日戰爭史分期中，1938年10月的廣州、武漢失守標誌著抗戰第一階段的終結。本書所論述的抗戰初期，則延伸至1938年年底。這是從外交史的角度出發而確定的。在這一時期內，德國對華政策已經完成了它的轉變，蘇聯對華政策亦已基本定型，而日本提出「東亞新秩序」和英美宣布戰時首批對華貸款，則標誌著各自的對華政策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一分期也許並不很準確，由於各國政策演變的性質和時間不可能劃一，要尋找一個適合所有國家的分期點是非常困難的。本書所論說的「抗戰初期」，並不企圖對整個抗戰史具有分期意義，它只不過是選取其事態發展具有相對的完整性和階段性的抗戰最初那段時間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

在迄今為止的抗戰外交史的研究中，對某一事件或某一國家的遠東政策的研究是比較常見的形式。而以抗戰初期為時間單元，以整個國際社會為觀察角度的專題研究則很少得見。本書進行這一方面的嘗試，是企圖彌補以往研究中的某些不足，盡可能擴大視角，以求對處於中日戰爭初期的國際社會得出一個比較系統的描繪。

在本書所敘述的這一時期內，中日戰爭由一地方事件發展成一場持久的全面戰爭。本文向自己所提出的問題是，與遠東事務有密切關係的國際社會是怎樣應付這一遠東危機的？作為華盛頓體系主要構造者的英、美、法等國，面臨著這一體系的崩潰，臺前幕後折衝尊卑，各種提議、聲明、會議和談判不絕於聞。然而，所有這一切都歸於徒

2 抗戰初期的遠東國際關係

勞，其癥結何在？隨著戰爭的擴大和日本野心的進一步暴露，英美對中國抗戰的考慮發生了哪些變化？它們是怎樣開始由「中立」轉向援華制日的？

長期以來被排斥於華盛頓體系之外的蘇聯卻表現出比英、美、法更為積極的態度。蘇聯在抗戰初期的大力援華已得史學界公認，但蘇聯援華是否有它自己的「度」？本書通過一些不為前人所注意的問題的分析，探討了蘇聯援華的動機及其限度，對一些似是而非的流行看法提出了疑問。

與日本簽有《反共產國際協定》的德國，是否如一些論著所說，在中日戰爭一開始就採取了與日本狼狽為奸的立場？本書的答案是否定的。事實表明，德國在1937年中的立場基本上是中立的。那麼，德國立場的逆轉又始於何時、基於何因呢？

圍繞著對華戰略，在日本決策層內始終存在著矛盾和鬥爭。在擴大與不擴大、戰爭與和談、誘蔣與誘汪等問題上，強硬派是怎樣占據了上風？而利令智昏的「東亞新秩序」的提出又帶來了什麼樣的後果？

面對錯綜複雜的國際形勢，國民政府採取了什麼樣的外交方針？它如何敦促國際社會對遠東危機採取干預行動？如何做到最大限度地孤立敵國、爭取友邦、在一定時期內獲得了來自不同陣營且利害關係各異的有關大國的支持？

在理論上說，在戰爭初期存在著以國際社會的集體力量制約日本、迫使戰爭中止的一線希望。然而，歷史留下的是遺憾。如何評價抗戰初期國際社會的所作所為？本書將在結語部分試圖回答這一問題。

本書是在作者的博士學位論文的基礎上修改擴充而成。在博士論文的寫作過程中，我的導師丁名楠先生給予了極為有益的指導和幫助，本書的研究成果也凝聚著他的心血。作者還得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近

代史研究所諸位先生的熱心幫助，張振鵬先生對論文的修改貢獻了許多極為寶貴的意見，李玉貞女士慷慨提供了她當時尚未發表的《蘇聯對外政策文件》的譯稿，陶文釗先生在有關資料及翻譯方面給予了莫大幫助。此外，在論文答辯過程中，余繩武先生、陳鐵健先生及北京外交學院的張之毅先生、北京大學的丁則勤先生的評論也使我獲益不淺。在此，謹向他們表示衷心的感謝。當然，本書中的一些不妥之處概由作者負責，它是作者的愚頑和孤陋所致。我誠懇地期待著各位專家和讀者的指教。

王建朗

1996年1月於北京

抗戰初期的遠東國際關係

目 次

主編者序

自 序

引言——戰前遠東局勢的回顧	1
第一章 盧溝橋風雲突起	7
第一節 現地解決與中央交涉	7
第二節 「對華一擊」與「以戰求和」	21
第二章 無所作爲的中立	33
第一節 國際社會反應不一	33
第二節 最初的調停努力	43
第三節 「中立」下的退卻	55
第三章 集體仲裁的失敗	67
第一節 國聯會議	67

第二節	布魯塞爾會議	81
第四章	華盛頓體系之外的蘇聯與德國	103
第一節	中蘇訂立《互不侵犯條約》	103
第二節	德國保持中立	118
第五章	陶德曼調停	131
第一節	日本謀求秘密談判	131
第二節	陶德曼調停始末	136
第三節	調停評析辨疑	148
第六章	南京失陷後的危機	159
第一節	中德關係的逆轉	159
第二節	「帕奈號」危機與英美合作機會的再次喪失	171
第三節	蘇聯出兵參戰之謎	181
第四節	蘇聯提供物資援助	192
第七章	中日秘密接觸	201
第一節	列強有意調停	201
第二節	多渠道的蔣日接觸	208
第三節	日本拉出了汪精衛	217
第八章	妥協與思考	233
第一節	列強繼續對日妥協	233
第二節	對中國抗戰的戰略思考	247

第三節 中國戰時外交方針的調整	261
第九章 「東亞新秩序」的反響	269
第一節 日本提出「東亞新秩序」	269
第二節 英美邁出援華步伐	275
結 語	289
後 記	295
主要參考書目	297
索 引	303

引言

——戰前遠東局勢的回顧

在世界性的經濟危機中，歷史進入了動盪不安的三〇年代。日本軍國主義首先在遠東拉開了武力侵略的序幕。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以赤裸裸的武力把中國東北置於其刺刀統治之下。

日本此舉是對遠東華盛頓體系的猛烈衝擊。它向列強表明，日本已決心破壞這一體系，背棄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原則，把中國作為它獨占的殖民地。「九一八事變」發出了要用武力重新瓜分世界的信號。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所確立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

對於日本的這一公然挑戰行為，除了美國發布了一通不承認主義的原則聲明，國際聯盟通過了一個沒有約束力的要求日本撤兵勸告案外，國際社會沒有作出應有的反應，基本上是以無可奈何的心情默認了日本的侵略。而日本則以悍然宣布退出國聯作為回答。「九一八事變」標誌著遠東地區華盛頓體系崩潰的開始。它還表明列強既沒有實力也沒有堅強的意志來維護這一體系。這對日本無疑是一種鼓勵。

這以後，日本軍國主義不斷向華北地區進行新的侵略擴張，並於1934年4月發表了針對列強的「天羽聲明」。日本聲稱它與中國有特殊關係，在東亞有特殊責任，維護東亞的和平及秩序是日本單獨的責任，無須他國干涉，並揚言如果他國暗助中國，日本不能置之不理。這一聲明公開暴露了它要獨霸中國和東亞而不容其他列強插手的野心。

為了取得和英美相抗衡的力量，日本急於掙脫華盛頓裁軍條約對

2 抗戰初期的遠東國際關係

於日本海軍的限制，因為該條約規定英、美、日海軍所擁有的戰艦噸位比例為 5：5：3。日本希望能放手發展其海軍力量。1934 年底，日本正式宣布廢除華盛頓海軍裁軍條約。在同年 10 月開始舉行的倫敦裁軍會議預備會議及以後的正式會議上，日本堅持要求取消現行的噸位比例規定，主張總噸位一律平等，但未為英美所接受。1936 年 1 月，日本宣布退出倫敦裁軍會議。

在日本於東方發難的同時，建立了法西斯政權的德國和意大利在西方向凡爾賽體系頻頻發起衝擊。德國提出建設歐洲新秩序的口號以否定凡爾賽體系。1933 年 10 月，德國宣布退出國聯。1935 年 3 月，德國單方面宣布廢除凡爾賽條約中限制德國軍備的條款，決定重整軍備，建立龐大的國防軍。1935 年 10 月，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亞，並在次年予以吞併。1936 年 3 月，德國宣布廢除洛迦諾公約，公然進軍萊茵非武裝區。1936 年 7 月，德意武裝干涉西班牙內戰，支持佛朗哥叛亂，隱然對英法的側翼形成威脅。

對凡爾賽和華盛頓體系的衝擊，在客觀上形成了對現存世界秩序進行挑戰的互相呼應的局面。同時，德意日在主觀上也意識到，它們之間的進一步配合將有利於各自在東西方的擴張。1936 年 11 月，日德簽訂《反共產國際協定》，在反共的旗幟下結成伙伴關係。意大利於次年加入。

東西方法西斯的興起與接近，促成了世界政治結構的另一變化，這就是以防範德意日為主要目的的其他大國的日益靠攏。作為現存世界秩序主要設計者和維護者的英美法之間的合作進一步加強。蘇聯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也得到改善。1933 年，一直對蘇聯持敵視態度的美國終於與蘇聯建立外交關係。1934 年，蘇聯加入國際聯盟。在東方，為了限制日益擴張的日本勢力，英美法開始加強與中國政府的關

係，協助中國從事增強國力的建設活動。但是西方國家這時都忙於克服經濟危機對本國帶來的災難，它們對東方事態的關注是極其有限的。蘇聯對日本的擴張也懷有高度的警惕，它在不斷增強其遠東軍備的同時，邁開了與中國改善國家關係的步伐。

這就是中日戰爭爆發前的遠東及國際形勢：一方面，日本在中國的擴張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反應，這一反應對中國是有利的；另一方面，由於德意在西方的行動，英美等列強對日反應能力又受到削弱。此外，國際社會反法西斯國家之間的結合也是非常鬆散的。歐美列強與蘇聯之間心存猜忌自不必說，就是英美之間也不能密切配合。以上這些因素，都將對日後遠東局勢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日本貪得無厭的侵略也迫使中國政府的對日政策產生了變化。很長一段時期以來，南京國民政府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對日本的侵略只是進行了有限的抵抗，而在總體上奉行的是委屈求全、忍讓求和的政策，先後與日本成立了「塘沽協定」、「何梅協議」、「秦土協定」等妥協性協議。然而，這種妥協態度雖然平息了一時的事態，但它並不能滿足日本軍國主義日益增大的胃口，又激起了中國廣大民眾和愛國官兵的強烈不滿。日本的步步緊逼已嚴重地威脅著國民政府對中國的有效統治，把它逐步逼到了退無可退的地步。國民政府開始在各方面作萬不得已時起而抗戰的準備。

在進行各種國防準備的同時，國民政府在外交領域也展開了積極的活動。面對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中國政府企圖借助英、美、蘇的力量以制約日本，因而在外交上日益向其靠攏。國民政府暫緩推行它在二〇年代末三〇年代初所倡導的以修訂不平等條約為主要內容的「革命外交」，注意加強與英美的聯繫。共同的需要，使中國與英美等國之間的關係日見密切。1933年，中美達成數額為5000萬美元的「棉

4 抗戰初期的遠東國際關係

麥貸款」協議。1935年，英國協助中國整頓金融，實行「幣制改革」。1936年5月，中美締結購售白銀協定，以穩定中國法幣。中國與蘇聯的關係也得以改善。兩國於1932年恢復了外交關係。這以後，雙方就有關兩國及遠東的安全問題多次進行秘密磋商。中德關係在這一時期也有長足發展，雙方在軍事及經濟領域的聯繫尤為密切。中國政府進行的這些外交活動，為抗戰爆發後世界各主要大國對中國的道義和物資支持打下了基礎。

在對日方針上，國民政府給自己確定了不可再退讓的最後界限。1935年11月15日，蔣介石在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蔣介石指出目前救國建國的唯一方針是「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犧牲有犧牲之決心，以抱定最後犧牲之決心，而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達奠定國家民族復興之目的」，倘以忍耐而求和平無望，則應「下最後之決心」^①。對於這「最後關頭」的具體限度，蔣介石於1936年7月作了進一步的明確說明：「中央對於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任何國家要來侵害我們的領土主權，我們絕對不能容忍。我們絕對不訂立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協定，並絕對不容忍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事實」，「說得明白些，假如有人強迫我們簽訂承認偽（滿洲）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時候，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後犧牲的時候。……從去年11月全國代表大會以後，我們遇有領土主權被人侵害，如果用盡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這個侵略，就是危害到我們國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這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到這時候，我們一定作最後之犧牲。」^②

① 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十三集，臺北，1984年版，第522-523頁。

② 《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十四集，第38頁。